

过了潮的海岸
留下的只有浪花
被道也让它逝去
这心灵的流星
我久在那朦胧的记忆中
寻求它的永恒

自题小诗

流星

青春无主

青春无主

刘海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过了潮的时光
 留下的只有回忆
 难道也让它逝去么
 这心灵的渴望
 我在这朦胧的回忆中
 寻找它的永恒

白桦小诗（诗选）

青春无主

柳海青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无主/刘海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0208 - 962 - 4

I. 青…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892 号

书 名:青春无主

出 版 人:董 伟

作 者:刘 海

责任编辑:曼 曼 张 峰

封面设计: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4

网 址:www. peopledailypres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00mm 1/16

字 数:250 千

印 张:17

印 数:10000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8 - 962 - 4

定 价:29.80 元

在苦难中奋进（代序）

魏晓霖

《圣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在森林中遇见一只饥饿的老虎，他慌忙逃跑，老虎穷追不舍，最后被老虎追到了悬崖边。与其被老虎吃掉，还不如跳崖，也许还有一线生机。想到这他就跳下了悬崖，结果卡在了一个结满梅子的树上。他听到悬崖下狮子的吼声，又看见有一黑一白的两只大老鼠在交替啃咬梅子的树干，他陷入了绝境，心反而平静了。心想被老鼠咬断树干跌死，总比被葬身狮口好，于是他找了一个三角形的树丫，坐了下来，摘了些梅子吃，想到迟早都是死不如好好睡一觉。吃了梅子后，这个人闭上眼睛便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黑和白的老鼠不见了，老虎、狮子也不见了。原来在他熟睡时，老虎按捺不住，冲着他跳下了悬崖，摔下了深渊，老鼠被老虎的吼声吓跑了，摔下山崖的老虎与狮子咬斗，双双负伤逃亡了。

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就像饥饿的老虎，一直追赶着我们；死亡就像凶猛的狮子一直在悬崖尽头等待我们；白天、黑夜交替如同黑、白老鼠，在不停地用力咬着我们暂时栖身的生活之树。

苦难之中的感知，比欢乐的体味更刻骨铭心。苦难的经历可以是人的宝贵财富，也可以是人的负资产。只有有着积极人生的人，才可以获得这笔财富。当我们以不屈的意志去对待苦难并战胜苦难时，我们就会在苦难的洗礼下，让生命充满成长的快乐，并让生命在苦难中幻化出瑰丽的色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更为坚强。

知青生活是新中国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景观，是千百万知识青年演奏出的一部雄浑悲壮的命运交响曲。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雨历程，而每个人又都是一部书。在人生的天平上，唯大波大澜大苦大难分量最为沉重。千百万知青曾经共同拥有这段历史的岁月，被这段特殊时代的烈

火焚烧过、锻造过。千万年后,我深信人们在废墟深处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化石和遗骨时,还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遗物中发现岁月的烙印,凹凸残缺地映照出知青岁月的真实痕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千百万知识青年以其青春年华谱写的这一页,将被用大字斧劈刀刻在祖国的泰山之顶的石壁上,与中华永存。

我在大学是学文学的,对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自从多年前做了刘晓庆的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一书的出品人后,就少涉足文化市场方面的事了,但我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化人,还一直注意着文坛上的些许事情。

海笛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我所钦佩的、我所赞美的、有着积极人生的人。他是我四川的同学,与他交往是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的日子。我来自工厂,他来自农村,我们都来自攀西(攀枝花、西昌)地区,故心贴得很近,彼此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常常在有星星夜晚的校园里谈着文学,谈着人生,谈着未来。

读海笛的长篇知青纪实小说《青春无主》后,我被深深地震憾了。又一次陷入对人生、对命运的沉思。看来我们这代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宿命,那就是生于苦难、死于忧患。

海笛懂得尊重人生。那种浸透了苦涩和甜酸的人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生命属于自己,任何一部分都是千金难买。在阅读中,一种深深的感动,作家的记忆,对生活执着的依恋,已融入了字里行间,只有珍惜人生的人,才会如此毫无功利地用心写就这些经历。激情燃烧的岁月给了我们难忘的回忆,曾经的往事既丰富了阅历,又使我们面对人生多了一份自信和从容。正如人民网强国博客那位叫云儿的网友所说:《青春无主》“如陈年的一壶老酒,会辣你,呛你,但最终也会醉你。”

我相信,这是当代中国文坛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全景式的文学大书。

目 录

一	001	告别美好的梦
二	011	生活的适应
三	016	龙飞的那些花花事儿
四	031	只要粮食不要命
五	039	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
六	050	酒醉后的“丰收舞”
七	057	我给农民当老师
八	075	遥远的回家“路”
九	087	家的记札
十	093	后山神秘的老人
十一	103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十二	117	大啖瘟猪肉
十三	124	三哥和他的情人
十四	135	夜晚的歌声
十五	151	会理县城的故事
十六	159	等待中的失望
十七	173	梦中的热吻
十八	189	爱上有夫之妇
十九	202	惊险的逃票
二十	211	偷枪
二十一	226	心中的金蔷薇
二十二	239	“白卷先生”张铁生
二十三	245	杀自己的猪让农民吃
二十四	254	终有梦圆时
后 记	265	

一 ★ 告别美好的梦

退了潮的海岸
留下的只有浪痕
难道也让它逝去
这心灵的流星
我只在那朦胧的记忆中
寻求它的永恒

——自题小诗《流星》

那年我刚16岁。16岁的花季、16岁的梦，梦还没有做，我就得下乡了。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就这么几句话，一夜之间全国各地学校都沸腾了，连我们这批仅读了一年初中的1968届学生，也被算成是知识青年，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的洪流当中。

一个个班、一个个学校都行动起来。许多同学都表了决心，贴出了大字报，还有的同学咬破了手指，用血写下誓言，那是何等壮观激动人心的场景。

我却并不激动，热血也没有一点沸腾，但我也只得随大流，跟其他同学

一样,无可奈何,稀里糊涂地下了户口。我不下乡是不行的,我的父亲“文革”前是一个小干部,因家庭出身问题,“文革”中被说成“阶级敌人”。每月仅发15元的生活费,被造反派遣送回川北农村的老家劳动改造去了。我母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四兄妹及我外婆,一大家子七口人仅靠母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生活,一到月底,就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出于这种情况,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我只能选择下乡。

下了户口的知青,能领到一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购买证。那天,我到派出所,仅几分钟就下了户口,领到一张知青购买证。我们学校下的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今西昌地区)会理县,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离成都有多远。我拿着这张知青购买证,手都在抖,心里犯了愁。我知道家里连吃饭的钱都不够,根本拿不出钱来为我置办下乡的东西。

我感受到了重重的压力,还害怕同学知道我父母有问题。我变得沉默孤僻,不敢与人交往,还是我的班主任朱福民老师看出了我的心事。他是个性格温和二十多岁的男老师,当时他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贴了大字报,遭到炮轰,但他对班上的学生依然十分关心。朱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问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他帮忙解决?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只得向老师哭诉了我的困境。

朱老师拍着我的肩说:“别哭,你先别急,让我给你想想法子。”第二天,我刚到学校,朱老师就叫住了我,递给我20元钱,对我说:“文笛,这个钱你拿着,这是我替你向学校提出的申请,学校给你补助下乡的钱。”

我拿着这笔钱,真不知向老师说什么,只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个躬。我用这个钱,购买了蚊帐之类的必需品。

下乡出发的前一天,我到了母亲单位。看见母亲正和一群人在劳动,搬着一堆沉重的砖头,几个戴红袖套的人站在一旁,有的在闲聊,有的在凶神恶煞地吆喝着。几个月不见,母亲憔悴了,当她知道第二天我就要离开成都时,她的眼神中闪出无奈和伤心,下意识地放下手中的砖,摸了摸衣服的口袋,大概是她想给我点钱,但在空空的口袋里她什么也没摸出来。

母亲失望地看着我,叫我到牛棚(被关的地方)去等她,我看见她向一位戴袖套的人走去。这人看着母亲向他走过去,立刻收起刚才和别人聊天的笑容,变成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这个人大概是个造反派头头,不知道母亲小声地向这个人说了些什么,只见他只一个劲地摇头。

母亲的脸色急得通红，一改她昔日的温和，大声地嚷起来：“你就没有娃娃当知青，我儿子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借点钱支持孩子到农村，以后你们从我的工资里扣除，还不行？”母亲的吼声，引来一群工人，人们议论着，那个头目怕引起工人的愤恨，慌忙把母亲喊进办公室。

当母亲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为母亲的安危而担心。我站在那里一会儿，就像过了很久很久一样，我的眼睛盯着办公室的门，直到母亲出现，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母亲从办公室出来，看见我，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她扬起手中刚借来的30元钱，拉着我的手，把钱全放在我的手中。

“儿子，这个钱你要拿好啊。”

我的鼻子直发酸，眼泪竟止不住吧嗒吧嗒直掉。

“孩子，你是男娃儿，要坚强些，对什么事都不要怕。到农村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全国那么多农民在农村都能过，你就不能过了吗？今后妈妈也要回老家去，和你爸爸一起种田去。”母亲难过地看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

母亲替我擦干了脸上的泪，又接着对我说：“到了乡下，要勤快点，对人不能有坏心眼，在农村找个能干的女孩子，安个家，妈妈我就放心了。”

听着母亲的话，如同母亲在和我作最后的诀别，此去何日是归期？想到伤心处，我的泪水再次流了出来。

“再见！”我怕哭出声来，让母亲再难过，慌忙向她挥了挥手，转身走了。我不敢回头，因为我感觉到母亲的目光一直在我的身后。

我的行装非常简单：一个小木箱、一个洗脸盆、两套工作服、十来本书以及我用知青证买来的蚊帐、被盖、知青盅盅等。

临走的那天早上，成都的天空笼罩着一层浓雾，大地像为我们的离开而蒙上了阴影。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叶在滴着水珠，像是为我们远离而伤心流泪。

我们学校共有700多名学生下乡，加上护送知青的工人宣传队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解放军、教师就达800人。送知青的30多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学校的大操场坝上，大卡车上撑上了车篷。没有传统电影里感人的送行的场面，没有进行曲，没有鲜花，没有欢送的队伍，只有那些自发黯淡送别知青的朋友和亲人们。

在送行的人流中，我企望寻求我熟悉的人影，但我失望了。我的父母和亲

人是不可能来送我的了,我的外婆已近70岁的高龄,我的两个妹妹都才十一二岁,昨天吵着要来送我,我怕她们哭哭啼啼的,劝了很久,她们才同意不来。

我和几个同学,把行李丢在车上,爬上了安排的汽车。还不到早晨八点,汽车就缓缓地开动了。学校操场茫茫一片依依惜别的人流,人手在挥动,人们在呼喊。有人哭了,似乎浓雾中也饱含了人们的泪水,让人感到初春阵阵的寒意。

“哎!她咋个没走?”同班的陈化忽然叫道。

我愣住了,是她,同班的小梅出现在送别的人群中,她的眼光好像在寻找什么人,她的手好像在向我们挥动。我想起那天工宣队师傅宣布下乡插队、男女生可以自由组合的政策的情景。

“我俩组合到一起下乡好吗?”放学后,我刚走到校门口。就见小梅迎面向我走来,她喊住了我,问我后,她的脸有些微微发红,眼睛低沉着,在等待我的回答。

当时,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着实被小梅的举动吓了一跳。我根本没想到班上还有女生愿意同我一起下乡。那阵我们学生很分男女生界线。男女同学不说话,也不往来。我虽然是班干部,但见到女同学也会脸红。

“我,我……”在我还没有对小梅作出明确答复的时候,就被过来的一群同班同学冲散了。我怕同学们看见我同小梅说话,慌忙住了口。

“走,班长,看电影去,再隔几天下乡后就看不成了。”那几个男生,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硬把我从校门口拉走了。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小梅。

自愿组合时金林提议,找几个女生好相互照顾,我想到了小梅,但我没有勇气去找她。当学校公布下乡名单的布告时,我找遍了名单,就是没有看到小梅的名字。

啊!是她,这是我在送行人群中发现的唯一熟悉的面庞。小梅站在送别的人群中,不知道她看见我没有,一副茫然的样子,带着苦涩和忧伤的神情,显得非常瘦弱。

汽车在缓慢地进行,我的眼睛模糊起来,为乡下的父亲,为牛棚里的母亲,为年老的外婆,为幼小的妹妹,为同班的小梅,为渺茫的前途,我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无所顾忌。

告别了幽幽的锦江水,告别了壮丽的人民南路。学校、街道,以及街道

两边的法国梧桐树都在我模糊的泪眼中晃荡，仿佛这一切都在向我告别。

这是何等壮观长长的汽车队伍，前边望不到头，后边望不到尾，跟着汽车跑动送行的人们挥动的手渐渐少了起来，汽车在这座城市的市中心慢慢地移动。

知青们都从车上探出头来，默默地注视着已是一片废墟的广场，这里是成都的老皇城，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立“四新”皇城的明清建筑已被拆毁，正在兴建一座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展览馆，工地上一片繁忙，12.26米的汉白玉的毛泽东挥手雕像即将落成，但还看不到头和雕像的全身。毛泽东雕像的右手高高举起，手掌向前伸展，仿佛给我们千百万知青指引着方向。许多同学默默地站立在快要落成的毛主席塑像前，好像在向老人家作下乡插队前的庄严宣誓。

不一会儿，街上看稀奇、看热闹的市民就围了上来。一些同学跳下了车，混在人群中，人群一挤，场面立刻有些骚乱了。几个军人的军帽被抓飞了。军帽在知青手中传来传去，一会儿就被传得没有了踪影。那几个被抓军帽的军人急得在人群中四处找寻，工宣队的师傅怕这样下去会出事，赶忙叫汽车司机快把车开走。

车队启动了，人民南路广场留下欢呼的市民和那几个无可奈何的军人。

车上那几个抢了军帽的同学异常兴奋，打着口哨，做着怪相，还向人群挥动着军帽……这是我们这批年轻人留给这座城市告别的纪念。

经过4天的颠簸，汽车终于开到了我们下乡的目的地——凉山州的会理县城。这里离成都已有一千六百多里路了，县城不大，却相当古老，十来分钟便可走完全城。

县城里的路铺满了青石板，十分平坦，矗立着一座古老的钟古楼，像一位忠厚的长者，在无言地看着我们的到来。

同学邱山说，他爸爸是当年的红军，1935年随毛主席来到了会理和云南一个叫皎平渡的地方强渡金沙江，成功地丢掉了后面的追兵。金沙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地势突变，两岸是高耸云端的悬崖，毛主席长征诗中“金沙水拍云崖暖”指的就是这里。红军转战千里，伤亡很大，过了皎平渡，红军兵临会理县城下，部队准备在这里休整，但遭到了国民党守军依仗坚固城墙的抵抗，红军用棺材装炸药，顶着湿棉被攻城数次不下，最后只得放弃。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遗憾，没有进入这座城。长征途中有名的“会理会议”还是在这里

城外开的。

邱山听他爸爸说,红军到达这里时,指战员们已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从遵义会议后,跟随毛泽东的红军队伍中江西人、湖南人较多,他们从江西到四川,对这里一切都感到陌生,许多人都议论毛泽东究竟要把大家带到哪里去。时为军团长的林彪也认为毛泽东不会指挥,“尽走了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在会理城外休整时,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让彭德怀来指挥红军。毛泽东在县城外的一座铁厂,召开了有名的“会理会议”,会上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意义,阐明了运动战战略的正确思想,批评林彪仅是个娃娃,还不懂什么。

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确保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后,红军继续北上。邱山的这些诉说,使我知道了我插队这个县的历史。

送我们知青的车队停在城边的五大公司(当时成昆线还没修通,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由北京、河南、安徽、上海、山东五个省市组成的运输公司)的食宿站里。县武装部为我们准备了晚餐,饭用一个大木桶装着,随便我们舀,菜却定量,每人一小勺。

这就是我们下乡的县城,故乡离我们远了,我们也远离了故乡。想起第一天,我们从成都出发,当晚停住雨城雅安的时候,同学们还有一种兴奋感,一路上有唱的、闹的,晚上很晚都不睡觉。但第二天,当汽车载着大伙翻泥巴山时,同学们的感觉就有了变化。

泥巴山在汉源县与荣经县之间交界处,主峰有3300多米高,山虽不高,路却艰险,山上还有积雪,汽车到这里都要挂上防滑链条。过泥巴山时,司机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说这里气候变化大,车祸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家心都紧了。

从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出来,这还是大伙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山,看到山上的积雪,同学们从心里感到凉意了,不知汽车要把我们载到何处去。

第二天汽车开向石棉县,晚上住石棉。这个县城不大,从泥巴山下来冕宁县到石棉县,汽车一路上都穿行在大凉山的谷地之中,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雄浑苍翠的大凉山,鲜独的彝族风光,途中有彝海,是当年刘伯承、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地方。红军就是从石棉县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

同学们头天夜晚的兴奋感早已荡然无存,再也听不到大伙的闹声和歌声了。晚饭后,同学们的情绪有些低落,有几个女生哭开了,悲伤的情感是要传染人的,到处都能听到哭声,大家感到了压抑。

第三天我们到达西昌。西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古称建昌郡。民国时,是原西康省的首府。这里彝汉杂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美丽的泸沽湖和邛海就是在这里。

住宿时,情况又有不同了。晚饭后,许多同学相邀去看西昌有名的邛海。这是金沙江支流安宁河上最大的风景湖。人们说这是西昌最美丽动人的湖。晴天,湖水清澈,蓝得见底,可见水中的游鱼和千年前沉入湖中的古城。那晚西昌的风很大,除我们知青外,邛海边很少见到其他的人,海面上只有几条孤零零的小船,显得非常荒凉。

我也跟着同学到了邛海,但那晚我什么也没看见,也并没感觉它的美,只那浩渺的邛海水,给我飘浮不定沧海桑田的感觉,倒让我觉得邛海的深不可测和自己前途的渺茫。

在会理县城的那几天,我们这拨知青可把县城给“折腾”苦了。首先是知青们不习惯那里一日只吃两餐饭;其次这饭呈红色,是用当地的红花米煮成的。知青们从小在城市长大,没见过泛红色的米饭,便认为这饭有问题,不像人吃的。

刚吃第一顿饭,大伙就咽不下,许多人只吃了几口大锅菜,便把饭都倒掉了。这可引起了县城附近的一些农民的注意,他们拿着盆子和桶守在路边,像一群乞丐,等待着知青们倒下的饭。那里的农民非常贫困,穿着非常破旧,倒能引起知青们的同情,把不想吃的饭大碗大碗地倒给他们。

这使我想起汽车刚进入西昌大凉山彝族地界,知青们第一次见到西昌最多的少数民族彝胞时的情景,大伙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居然还这么贫穷。彝胞们大都赤着脚,披着破旧的擦耳瓦(彝族的民族服装)。

一进入凉山的地界,在我们汽车的后面,随时都有一群群彝胞呼喊跟着汽车奔跑,还有一些小彝胞,他们都向我们伸出骨瘦嶙嶙的手。弄了很久我们才搞懂,他们是向我们要东西。

一些同学,把手中的干粮和几个中午没吃的麻饼向汽车下抛去,那些彝胞飞快地争抢着,眼疾手快地把抢到的东西往衣服里塞,一会儿又飞快地跟了上来。

这些彝胞一边大声说着彝族的语言,似乎是在向我们表示谢意,一边又向我们挥着手表示还要,直到抛完我们所能抛出的东西,拿着空空的口袋向他们表示再没有时,他们才肯停下来。彝胞们不歇气跑山路的速度跟汽车差不多,真让人不可思议。

我们住在会理县的头天晚上,谣言在知青中四起,有人说,会理的乡下蛇比桶还粗,非常恐怖;到处都有麻风病人,遇到可不得了。这些话与我们在成都时听动员下乡时的话就根本不一样。知青们有了上当受骗之感,大家的愤怒有如火山般地爆发,于是有几个知青大叫起来,同学们,我们遭烧了(受骗了),大家要团结,不要下汽车,也不要忙到下生产队,要叫送我们的人还我们的户口,大伙一起回城去。

经这么一闹,同学们都收拾东西呆在车上,这可把好端端的一个县城给搅乱了。县委原定开四天的全县农村三级干部会(公社、区、县),只开了一天,就因知青的问题提前宣告结束,并跟各级干部说安排这批知青才是当务之急。县委原计划只给知青们安排了两顿饭,是头天刚到那个下午吃一顿,第二天早上吃一顿,就让各区、各个公社的干部把知青带走。现在情况变了,知青赖在车上,不下来,嚷着要回成都,一拖就是几天,几十个车,上百号人,每天的饭总是要安排的。虽然每天只吃两顿饭,但这么多人下来,后勤工作根本无法跟上,饭不行,菜也差得很。

每到开饭时,一些知青满街用调羹敲着知青盅盅,以示抗议。还有些知青把刚打来的饭倒给了当地的农民。他们反而进餐馆吃饭,但不给钱,到茶铺去喝茶,不付茶钱不说,连茶碗也一起带走。知青们仗着人多年轻不怕事,见街上小商、小贩的东西也要拿,连街上人家卖的瓜子、花生也抓起来吃。吓得街上的小商贩胆战心惊,县城的商店纷纷关门。

一夜之间,县城的街头顿时冷冷清清,关门闭户的,居民们都像如临大敌,不敢出门,胆战心惊地躲在屋里过日子,不敢上街,怕遇到知青出事。这可急坏了学校送知青的解放军宣传队政委、工宣队队长,他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知青谁也不听他们的指挥了,反而找他们,要让他们退还户口。

知青说要找校革委主任,但这位主任早就逃之夭夭,人都找不到,大伙恨得咬牙切齿。据有同学说原本我校学生该下在离成都很近的郊县,就这位主任他一句话,说我们这所中学是李井泉(西南局书记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的红旗学校,干部子女多,应该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锻炼。这样我们就被分到了会理县,离成都已有一千多里路。你说大伙能不恨他吗?可这位主任狡猾,一路打前站,知道情况不妙,当我们的车队还在石棉时,他早就脚板上擦油溜回成都了。我想他不溜的话,一定够他受的。许多知青一直在唱:“丢翻他,放他的血,我们要造反,我们要回家。”

到达会理县城的第二天,县武装部的伙食已开不下去,因为没准备那么多的东西,这一来五大公司的食宿站可就遭殃了。食宿站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做饭。知青们没饭吃,急了,有几个武斗队的同学领头,砸开了食宿站的保管室,把食宿站的东西给瓜分了,每个同学都分得了一些米、黄豆、粉条什么的,干脆让大家自己想办法。

知青们拿着这些分来的东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就在食宿站的空坝里,用洗脸盆、知青盅盅把分来的东西吃了。

在学校时同学中就有两派红卫兵组织,一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派;一派是四川大学8·26造反派,简称8·26派。这两派学生在成都“文革”中非常对立,还发生过武斗。

下乡时,8·26派同学多数都跟别的学校走了,红成派的同学跟学校走的占绝大多数。十多个在成都参加过武斗的红成派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拿着棍棒,有的手中还提着刀,舞着皮带,头上戴着沿途抢来的军帽,威风得很。到县城的第一天晚饭后,这些武斗队的知青从同学中抓出几个不同观点的,先是一阵暴打,然后把这些同学围在食宿站的坝子中间,强迫让这些同学跳“忠字舞”。

当这些同学跳舞时,又有人发现一个不同观点的体育老师,这些人又立刻把他给围上了。还好这个老师沉着,虽然吓得说话都有点颤抖,但还是忙把身上带的几包香烟全摸了出来,雨点般地撒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学,还把火柴划燃,替大家把烟给点上,方平息了这伙人的愤怒,免去了一场皮肉之苦。可怜那几个被打的同学,满脸是血,还无奈地一边跳着“忠字舞”,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这些昔日的红卫兵们,把他们心中的愤怒全发泄到这些不同组织同学的身上。

在当时,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过任何红卫兵组织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麻五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知青,是不敢多嘴的,怕惹火烧身。在那种情况下,武斗队的同学眼睛都打红了,哪还分得清好坏,分得清善恶、是非,

反正看谁不顺眼,谁就会遭殃。

到后来几天,生活越发混乱和艰难了。一天,一个老农的山羊被知青们强行拉来宰了。老农民哭着哀求了半天,才有人同意让他把羊皮拿回去。又有几个知青,不知从哪里抓来了几只鸡、两只鹅,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抬来一口大的毛边锅,用砖头支起,点燃了火,把羊肉、鸡肉、鹅肉砍成坨坨,一锅煮成大杂烩。这些同学也想到了其他同学,最后每个同学都分上了一勺杂烩汤。

会理县城老一点的人也许忘不了,我们这拨知青当时留给他们不好的回忆。那时已有人把我们当成了洪水猛兽,称知青为“知匪”。

我们知青到会理县时,县城里也有对垒的两派组织。知青一来,对垒的两派组织居然停止了武斗,联合起来,达成了协议,一致来对付知青,说要教训教训我们。

在县城的那几个晚上,会理古老的钟鼓楼上,会不时传出些枪响。知青中年龄大点的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每人拖一根棍棒,在车下巡逻。年龄小的男生、女生都蜷缩在汽车里,真是提心吊胆地害怕得很,生怕打起来。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带队的军宣队、工宣队没有一点办法。同学们谁也不听他们的指挥,他们只好急忙打电报向省革委汇报情况,请示省革委该怎么办。

直到我们在县城的第三天,省革委才派来一名干部。这名干部一到县城,就召开了紧急的解宣队、工宣队、知青代表会。会上这名干部传达了省革委的精神,当场作出了决定:凡是不愿插队的知青,全都退还户口,发给路费,安排回成都;愿意插队的知青,均保证用车送到每一个公社,再由公社安排农民接到每一个生产队。

决定一宣布,来时700多人的知青队伍,一下就少了400多人,食宿站的空坝上放下了许多行李。在会理县城停了四天的汽车队又启动了,它载着留下的300多名知青,开向会理的两个区,100多个生产队。我就是这300多名知青中的一员,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五年知青生活。

二 ★ 生活的适应

★ 汽车载着我朝下乡的公社开去,几十辆汽车队伍逐步开始分散,车队越来越小,最后到我所到的公社时仅剩两辆汽车了。我所到的公社知青有三十多人,汽车把我们载到公社外的公路边,放下我们的行李,便朝渡口(今攀枝花市)方向绝尘而去。

在公路边的机耕小道上,公社干部带着分配有知青生产队的农民来了。这些农民站在机耕小道上,敲着锣鼓,虽然人不多,但我第一次看到欢迎知青的队伍。这些农民穿着很破旧,但他们的脸上却流露出淳朴的笑容。这里的农民们对毛主席欢迎知青到农村的最高指示在认真地执行,他们热情地欢迎知青们的到来。

那天,公社的社长和干部都来了,管知青工作的武装部部长对我们知青简单讲了几句话以示欢迎,之后便点了名,把知青一一介绍给各自来接我们的农民。叫到我和陈化、金林的名字时,迎面走来一中年妇女,头上戴一顶用青布盘的大圆帽,腰上系着藏青色小碎花的围腰,脚上穿一双图案绣花布鞋,这是当时凉山一带妇女时髦的装束。她脸很黑,眼角满是皱纹,背有些微弓,人显得苍老,我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好像比我 70 多岁的外婆还显得老些。她向我们介绍她是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

“婆婆,生产队还有没有其他人来接我们?”我问。

“这几天队里活路多,只有我和民兵排长、小胡来接你们。”妇女队长怔了一下,她指着旁边一中年汉子和一位青年农民说。